

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不能“移标易识”

——对黄帝拜祭地点问题的看法和见解

延安炎黄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延安大学兼职教授、延安市政协原主席 樊高林

历史问题，要靠史实说话。多中心则是无中心。要取消国人世代形成的植根于灵魂深处的圣地——黄陵，而另“创造”一个所谓的“圣地”，还是要考虑国人的感受。祭拜始祖本是好事，有一个诚字足矣，而不是讲规模，抑此扬彼。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不能“去真存伪”，移标易识！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2月在陕西视察时指出：黄帝陵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这一论断是对黄帝文化几千年积淀的精辟概括。从司马迁的《史记》到后世历代典籍、方志、碑铭和祭祀活动，都能充分证明这一点。

然而，某知名媒体今年9月7日和11月9日两次刊登了许嘉璐等学者的文章，提出“历代对黄帝对先祖是‘拜庙不拜陵’”，并提议“拜祭黄帝应该上升到国家级；拜祭定点在新郑”。对此，笔者持不同见解。若照上述文章说法，陕西黄帝陵庙的拜祭活动就不算定点了？笔者认为，我们不应该无视几千年来来的历史研究成果和已被公认的史实，陕西黄陵县黄帝陵庙的拜祭早已成为国家级祭祀了，中华民族的根脉不能挖，不能移标易识。

黄帝生于三月三是个“创新”提法。翻开老祖先传下来的老皇历，一直记载“七月十三，黄帝诞”。民间文化一直认为“王母生于三月三，不死不灭。”《黄帝内经》曰：“帝与王母会于王屋，乃铸火镜十二面，随月用之，则镜始于轩辕矣。”《西京杂记》曰：“黄帝时，西王母献昭华玉琯。”《玄女兵法》曰：“王母遣使者以授符。王母乃命九天玄女授帝以三宫五音。”《龙鱼河图》曰：“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王母与九天玄女，是我国母系氏族社会人们树立的女神。这些记述虽是神话传说，但也说明王母与黄帝有交往，且从未有传说他们恰巧生于同一天。神话是人类童年时期的珍贵记忆和美好理想。神话就是遥远的人话，是后人世代沿袭传承，对远古历史的再现。神话是文字信史的序言，信史则是神话的续篇。人们世代口口相传的是：七月十三黄帝诞，九月九黄帝乘龙升天。难道十多年前才突然发现黄帝又生于“三月三”？把黄帝生辰硬说在三月三，无非是这一天大多年份在清明节之前而已。

关于“历代对黄帝对先祖是‘拜庙不拜陵’”之说，于史无据。中华民族历来就有祭祖的传统美德，试问从天子到庶民，谁不祭拜自己的祖陵？德高望重的祖先都是先为人，而后被尊为神，进入庙堂，享陵庙同祭祀。据《路史·疏仡纪·黄帝》载：（黄帝铸鼎）“八月既望，鼎成死焉，葬上郡阳周之桥山。其臣左彻感思，取衣冠几杖而庙飨之，率诸侯而朝焉。”《纪年》载：“帝以土德王，应地裂而沛葬，群臣有左彻者，感思帝德，取衣冠几杖而庙飨之，诸侯大夫岁时朝焉。”可见陵庙同祀久矣。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刘彻巡朔方还，率18万大军祭祀黄帝，祈求效法黄帝升天，筑汉武帝仙台。

汉明帝刘庄永平二年（公元59年）颁诏“诸侯祭天子，天子祭黄帝”为礼制，在桥山建立了“黄帝庙”。延续至今，黄陵人仍称黄帝庙，很少有人叫“轩辕庙”。

北魏拓跋嗣神瑞二年（公元415年）六月，派遣使臣以太牢（牛、羊、猪三牲大礼）祀黄帝庙（《魏书·太宗纪》）。

南朝宋孝武帝刘骏大明四年(公元 460 年)降旨,令郡县五谷丰登后祭祀黄帝,祭祀前整修陵庙,以示慎终追远。古中部县(今黄陵县)城门楼上匾额曾题为“追远门”。

唐代宗李豫大历四年(公元 769 年),鄜(鄜州,今富县)坊(坊州,即中部县,今黄陵县)节度使臧希让上疏,坊州有轩辕庙,请求修葺并列入国家祀典。代宗准奏。桥山轩辕黄帝庙遂入国家祀典,后世得以继承(见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帝王部·修废》《中部县志》)。

宋太祖赵匡胤开宝五年(公元 972 年)降旨整修轩辕黄帝庙,将唐大历中所建黄帝庙由桥山西麓移今址扩建,并规定每 10 年祭祀 3 次。宋人李昉《黄帝庙碑序》(《陕西通志》)记述了这次重修状况。宋仁宗赵祜嘉祐六年(公元 1061 年)正月二十八日,遣使赴坊州祭祀黄帝陵庙,使臣回朝禀报,桥山柏树长得不佳。仁宗即下旨,派官员以拾贯银钱买庶民幼柏 1415 株,并雇用寇守文、王文政、杨迈 3 户百姓人家入春栽植管护。此碑现存庙院内。桥山的几万株古柏林就是这样世代延续营造而成的。

元泰定二年(公元 1325 年),桥山黄帝庙保生宫发生火灾,庙宇周围柏树尽毁。也松铁木儿皇帝闻奏大怒,亲拟圣旨一道,令以蒙汉双语刻成碑文竖于庙院,以儆摄扰庙毁树不法之徒。时过 690 年了,此碑仍在,这便是一道最早的保庙护林法令。元顺帝至元乙巳(公元 1365 年)对黄帝庙又进行了修葺。元人张敏撰《重修黄帝庙碑记》,明弘治本《延安府志》,明郑汝璧《延绥镇志》均有记载。

明太祖朱元璋对先祖崇敬有加,洪武三年(公元 1370 年),派遣秘书监丞陶谊赴中部修缮黄帝陵庙,并筹划祭祀。太祖皇帝亲撰祭文。这通“御制祝文”碑至今立于黄帝庙碑廊内。洪武四年(公元 1371 年),朱元璋降旨,规定祭祀黄帝由皇帝或派遣大臣前往,桥山黄帝陵庙为祭祀圣地,三年为一大祭。祭文及祭祀日期、祭品,主祭、陪祭文武官员均勒于碑石。这一旨意对后世能保留下几十通祭祀“御制祝文”碑铭,至关重要。之后又特别降旨,中部县令官正五品,另设护陵庙官二员。并赋予中部县令三项特权:一是朝廷官员来中部,县令可不出城恭迎;二是有损毁陵庙、柏树者可先斩后奏;三是上朝禀告黄帝陵庙事宜可由内务府直接引见圣上。洪武七年(公元 1374 年),太祖再降旨,在中部轩辕庙大殿内,敬塑黄帝像一尊,以利世人瞻仰祭祀。此后,以朝廷既定仪规祭祀黄帝陵庙已成典章延续后世。

清朝对中部黄帝陵庙的祭祀更多,规模宏大,仪典隆重。清世祖顺治皇帝福临入关,当年即派遣专使到黄帝陵庙举行认祖归宗祭祀。圣祖康熙皇帝玄烨在位 61 年,派使臣祭祀黄帝陵庙 10 次。高祖乾隆皇帝弘历在位 60 年,派专使祭祀黄帝陵庙 9 次。仁宗嘉庆皇帝颙琰在位 25 年,派专使祭祀黄帝陵庙 3 次。宣宗道光皇帝旻宁在位 30 年,派专使祭祀黄帝陵庙 3 次。大凡皇帝登基、国家庆典、平息动乱、太后寿诞,均要告祭先祖。且每次祭祀都有“御制祝文”,这些碑铭至今陈列黄帝庙碑廊之中。特别是康熙年间,黄河、淮河泛滥成灾,两岸百姓深受其害。康熙帝集全国之力,大兴治理。十几年后工程告竣。康熙四十二年(公元 1703 年)皇帝巡视工程后甚嘉,遂亲撰祭文,派大理寺少卿莫音赴中部代祭黄帝陵庙。治黄淮成功,感恩先祖护佑。

到近代,台湾著名爱国人士邱逢甲抗议《马关条约》,亲率八千弟子“抗倭守土”,与日寇浴血奋战二十多个昼夜,终因孤军作战而败,被迫离开台湾回到大陆,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中部祭拜黄帝陵庙。并留下著名诗篇,抒发对台湾沦陷的悲痛和对祖国“山河终一统”的企盼。

史实雄辩地证明,历朝历代各民族皇帝都亲自或派员到黄帝陵庙祭祀我们共同的祖先,即便战乱年间,黄帝陵庙也得到有效保护,可见黄帝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是多么神圣。

民国元年(1912 年)孙中山就任民国大总统,于 3 月派遣 15 人专团,赴陕西中部县(今黄陵县)桥山,致祭黄帝陵庙,并亲撰祭文及《黄帝赞》:中华开国五千年,神州轩辕自古传。创造指南车,平定蚩尤乱,世界文明,唯有我先。此碑现存黄帝庙碑亭中。1918 年,国民党元老、民国政府原监察院院长、著名学者、书法家于右任先生冒雨来中部桥山祭拜黄帝陵庙,并赋诗为念。之后,于右任先生查阅大量史籍,编著成《黄帝功德纪》,这是迄今黄帝文化研究珍贵的文献资料。1937 年 4 月 5 日,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的第一个清明节。

国民党中央特派张继、顾祝同;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特派陕西省政府主席孙蔚如;中共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派代表林祖涵(林伯渠),共赴中部,在黄帝庙院内举行祭祖典礼。三方分别恭致祭文。中共祭文由毛泽东主席亲自书写,此碑现存黄帝庙碑亭中。1938年4月4日清明节,国民党委派西北行营主任、陕西省主席蒋鼎文前往祭祀黄帝陵庙,亲笔为黄帝庙题写楷书匾额“轩辕庙”。同往祭祀的还有国军一级上将、时任一战区司令长官、河南省主席的程潜(1949年8月率部在长沙起义。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为黄帝庙大殿题写了“人文初祖”隶书匾额。两幅匾额至今分别在黄帝庙门和大殿悬挂。

新中国建立后,党中央和国务院对黄帝陵庙的建设和祭祀典礼十分关心,一直由陕西省及黄陵县代国家举行祭祀。1977年北京毛主席纪念馆周围,在黄帝陵庙所在的桥山精选13棵茁壮青松移栽,寓意毛主席在延安十三年,把毛主席缔造新中国的伟业和黄帝始祖的功德根脉联系起来。延安地区在黄帝庙前举行隆重起运仪式,于3月22日送往北京。1990年4月19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瑞环,在时任陕西省委书记张勃兴陪同下,赴黄陵县拜谒了黄帝陵庙。他看了庙院碑廊里的历代祭祀碑铭,对黄帝陵庙景区的状况表示遗憾,认为与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很不相称。回京后,在他的重视下,启动了综合整修意向,经多次讨论、完善规划、设计方案,要将黄帝陵建设成全球华人寻根祭祖圣地。1992年4月4日清明节,陕西各界、国家有关部委和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5000多人在黄帝庙举行祭祀大典,并举行新修轩辕殿和祭祀广场工程奠基开工仪式。10月,中华黄帝陵基金会成立,李瑞环任名誉会长。1993年4月5日清明节,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为黄帝庙题词:“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此碑立于轩辕庙院内。1994年4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整修保护黄帝陵,增强民族凝聚力》。号召中华民族团结在黄帝旗帜下,努力实现伟大复兴。1997年4月5日清明节,国务委员宋健,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兆国出席公祭轩辕黄帝典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各省、市、自治区代表,港澳台、海外华侨代表参加祭祀大典。4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拜谒黄帝陵庙,并题词:“继往开来,强我中华”。1998年4月5日清明节黄帝祭祀大典暨香港回归祖国纪念碑揭幕仪式在轩辕庙广场隆重举行。2000年4月5日清明节黄帝祭祀大典暨澳门回归祖国纪念碑揭幕仪式在轩辕庙广场隆重举行。2002年4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佩云,全国政协副主席孙孚凌出席壬午清明公祭黄帝典礼。10月26日,中华黄帝陵基金会成立10周年暨黄帝陵庙整修工作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中华黄帝陵基金会名誉会长李瑞环同志出席,强调要进一步把黄帝陵庙整修好、保护好、管理好。并提议将黄帝祭祀确定为国家祭祀。2003年4月5日癸未清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出席黄帝公祭典礼。2004年3月2日,轩辕黄帝石画像神主在新的祭祀大殿落成。4月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全国政协副主席李蒙出席甲申清明公祭黄帝典礼。这次典礼在新落成的祭祀广场举行,正式明确国家祭祀,仪典规范为7项,将以往的鸣钟,改为击鼓(龙威大鼓)、鸣钟(龙魂大钟),将挖掘整理的祭祀乐舞确定为国家级礼仪演奏。仪典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每年国家均派一名全国人大领导、一名全国政协领导出席公祭典礼。2005年4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来延安视察,专程拜谒黄帝陵庙。4月6日,乙酉清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代表国家出席黄帝祭祀典礼。

三

许嘉璐副委员长以国家主祭人的身份曾出席过两次祭祀大典,然而,时过十年,作为语言学家的许嘉璐教授,又提出了要将拜祖上升为国家祭拜并定点在新郑的建议。难道您来黄陵,出任两次主祭人不代表国家,而是个人行为?“祭拜”一词,我理解本来意思就指祭灵拜祖,还有陵庙之分?就按“拜庙不拜陵”而言,黄陵县的黄帝庙难道不是庙?

另几位学界泰斗的论说也让人不敢恭维。一位先生说:“帝王庙最早是唐玄宗时期建的,在

此之前是到墓地祭拜，后来的政治家从唐代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就改到帝王庙祭拜”。而许嘉璐先生却说“拜庙不拜陵”是从周代就开始了。两位泰斗的说法岂不互相矛盾了吗？

另一位先生说：“帝王庙最早拜的都是黄帝，之后祭拜黄帝历代不衰”，这话还是符合史实的。接着又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志符号不行，因为其他的东西说多了记不住，符号容易记，符号一看就记清楚了”。难道几千年来公认黄帝标识“符号”还记不住，只有新立一个“符号”才能记清楚吗？

还有一位先生说：“大典已经做了十年，从各方面来讲，组织大典都具备了充分经验，而且规模越做越大”……“在新郑拜祖更是当之无愧”。用“十年”的经验，来取代否定几千年的祭祀史实，而且这一祀典已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现在要否定，这一史实能否定得了吗？国人会答应吗？看来陕西黄陵千百年的国家级祭祀是“当之无愧”了。那篇题为《国家拜祭体现时代创造力》的纪要，也让人茫然。黄帝始祖祭拜已几千年了，怎么才有如此“创造”？纪要中说：“通过祭拜黄帝，可以把古今打通，把当代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建立在古代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之上，把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立在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把中国的光明未来建立在灿烂的历史基础上”。难道只有在新郑搞祭拜才能达到如此效果吗？中华民族过去的辉煌和光明是建立在废墟之上的吗？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要增强文化自信、文化自觉。自信决定自觉。如果对我们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没有自信，就必然会导致生出一些“去真存伪”的乱象。如果受到某些利益驱使，就必然会导致“移标易识”，朝秦暮楚的误导。十多年前，某地兴师动众，不惜百姓血汗，在山脉上用钢筋水泥打造一条几十公里长的水泥巨龙，幸亏被中央叫停，不然要破坏多少生态环境。中华民族的龙图腾崇拜在子孙们的心目中，血液里，而不是用水泥堆砌。黄帝庙院那棵几千年的世界第一巨柏（相传为黄帝手植柏），也不是几十年、几百年就能长成的，更不是用钢筋水泥撑起来的。桥山几万株古柏便是悠久历史的最好见证。

历史问题，要靠史实说话。多中心则是无中心。要取消国人世代形成的植根于灵魂深处的圣地——黄陵，而另“创造”一个所谓的“圣地”，还是要考虑国人的感受。祭拜始祖本是好事，有一个诚字足矣，而不是讲规模，抑此扬彼。

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不能“去真存伪”，移标易识！